

2005

# 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

2005 Strategic Report: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http://www.sciencep.com)



# 2005 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

*2004 Strategic Report: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报告以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为主题,集中讨论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背景、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设计;对于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缓解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完成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历年战略报告的基础上,应用中国科学院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于中国各地区的统计分析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进行了全面的更新。

本报告对各级决策部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以及有关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社会公众,具有连续性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2005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  
ISBN 7-03-015035-X

I. 2… II. 中… III. 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05 IV. X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896 号

---

责任编辑:李 敏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5 1/2 插页:2

印数:1—14 000 字数:720 000

定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 中国科学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总策划：曹效业

##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组 长 牛文元  
副组长 刘 毅 李喜先  
成 员 王 毅 胡 非 蔡 晨  
杨多贵 陈劭锋 陈 锐

## 《2005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研究组

组长兼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研究组成员 杨多贵 陈劭锋 陈 锐  
王海燕 贺铁林 汪云林  
李 冬 朱良平 岳天祥  
战金艳 范泽孟 王 徽  
高络华 郑爱丽 秦明周  
李丽俭 康大臣 刘雅莘

本报告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 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代序)

路甬祥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和浪费，仍占主导地位的粗放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环境的大量污染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导致一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严峻的现实警示我们：如果仍以高消耗、高污染以及一系列社会、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发展，我国的发展将难以为继。如何将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同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道路，如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 一 充分认识协调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长期以来，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相对紧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人与资源和人与环境两个方面。

## 1. 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不合理的利用方式加剧了资源短缺程度

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和资源利用率低的矛盾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目前，我国主要资源(能源、矿物资源、水、耕地等)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或 1/3，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4 倍。预计至 2020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4 亿~15 亿，人均资源占有量将持续下降，人均资源消耗量也将显著增加。如果不改变资源结构与利用方式，资源短缺将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协调加剧了我国人与资源的矛盾。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我国主要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更为显著。例如，我国约 82% 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64% 的耕地集中在北方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处在水资源短缺的华北地区；20% 以上的可开发水力资源集中于西南地区，70% 的煤炭资源集中在晋、陕、蒙地区。因此，合理配置和使用资源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为重要。但是近年来，一些区域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忽视地域特点和比较优势，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十分严重，区域内和区域间有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正在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并付出巨大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例如，在某些水资源匮乏地区发展高耗水产业；在能源短缺地区发展高耗能产业；在环境脆弱地区发展高污染产业；在耕地资源匮乏地区发展土地耗费型产业，甚至滥占滥用耕地。部分地区脱离我国人口和资源的基本国情，片面追求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供给的紧张状况。

战略性资源供需矛盾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战略性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当前，世界各国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我国战略性资源供需关系比较紧张，部分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例如，2003 年我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超过 30%，预计 2020 年将超过 50%。因此，在考虑我国人与资源关系时，必须把战略性资源的保障放在突出位置。如果我国不能及时建立战略性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替代、动态优化和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综合应变能力，一旦战

略性资源供需矛盾超出一定的限度,势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

## 2. 自然环境脆弱,工业化进程加快,治理不足,人与环境矛盾日趋尖锐

自然环境脆弱。干旱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52%,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面积达64万平方公里,石漠化的岩溶地区面积达90万平方公里。这些环境脆弱区域严酷的自然条件难以承受庞大的人口压力,难以支撑大规模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

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近年来我国生态退化范围迅速扩大,危害程度日趋加剧。主要表现为:原始林所剩无几,森林总体质量低下;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加速,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复合性环境污染加剧。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某些区域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清洁安全饮用水、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 3. 环境严重污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大气污染导致我国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有证据表明,在我国11个大城市中,燃煤产生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5万多人死亡,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2000年,我国北方某城市40%的儿童的血铅含量超标。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导致癌症、畸形发病率提高和生殖能力下降。目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素(EDs)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环境介质中常有检出。例如,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城市的大气中,挥发性毒害有机物(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浓度已明显超过一些发达

国家水平；在我国个别城市的奶粉、牛奶甚至母乳中已检出高含量二噁英类化合物。这些污染物具有难降解、生物富集、毒性大等特点，一旦进入环境，很容易发生迁移和扩散，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致癌、致畸、致基因突变并影响人类繁衍。

## 二 统筹我国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根据有关方面分析，按照现有的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水平，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环境承受的压力将比2000年提高4~5倍；如果环境质量保持不变，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则必须提高4~5倍；如果资源消耗和污染负荷比2000年减少一半，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就必须提高8~10倍。显然，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健全法制，加强监管，政策引导，公众参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1. 坚持改革发展，依靠科技进步

推进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调整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前，首先应从我国地域分异规律出发，充分考虑资源特征和区域比较优势，花大力气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其次应紧紧抓住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信息化和清洁化等高新技术手段，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进而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转变。

发挥市场作用，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市场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而且也可以在调整人与资源关系中发挥积极影响。一是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反映资源环境真实成本，切实让资源使用者和污染排放者承担相应费用，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二是创建环境资源市场，



如水市场、排污交易市场等，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在资源环境相关的公共投资中引入市场机制，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益。四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积极开发、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  
间，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深化规律认知，创新环境友好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与主要标志。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当前，首先应加快国家资源环境能力建设，建立与完善覆盖全国的国土与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发展基于“数字地球”理念的资源环境信息技术平台，全面系统认识自然过程和人的活动对生态环境及人类自身发展影响的客观规律，为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整治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技术，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发展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和新的替代能源技术，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提供高效、安全、清洁的技术体系。

## 2. 健全法律法规，推进制度创新

完善法规体系，建立科学决策机制。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应着手修改或废除实践已经证明过时或存在严重缺陷的法律法规或条文，逐步健全生态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还应加强综合决策机制的建设，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整治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做到互通信息，民主协商，统筹安排，科学决策。

明确政府职能，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跨部门、跨地域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协调治理，其中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从我国现实情况

出发,一是应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全局,理顺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职责;二是应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跨部门、跨地域的协调机制,统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区域性问题。

### 3. 科学编制规划, 加强政策引导

做好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在国家层面,应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有关措施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全局角度处理好保护、开发、治理与建设的关系;尽快启动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在地区层面,应将区域或流域综合开发整治作为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使用、生态环境保护及社区的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在政策引导方面,应对发展政策进行充分的资源环境影响评估,避免和减少不适当的发展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新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推进清洁的能源结构、资源集约型基础设施和环境友好的产业。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应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增加资源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全面真实反映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状况。此外,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工作中的贡献应成为考核评价各级干部的重要内容。

### 4. 提高科学认识, 鼓励公众参与

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应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实行统一领导,推进社会协调治理。继续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在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实行党委统一领导。通过各部门分工负责、企业与社会积极参与，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协调治理，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方式。各级政府可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沟通；同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鼓励公众及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导言)

牛文元

## 一 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

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 二 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

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 1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 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 (1) 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 (2) 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 (3) 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 (4) 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 (5) 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 (6) 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 (7) 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

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四 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 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 20 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 50 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 2002 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 62%，低收入国家为 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 40%。至 2000 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 12 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 40 个百分点。虽然从 1949 年全国建市 67 个增长至目前的 600 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 20 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 五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 (1) 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 (2) 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 (3) 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 (4) 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 (5)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 (6) 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 (7) 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 (8) 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 六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



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 七 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